

■馆藏拾粹

烟云尽态：舌尖上的《三希堂法帖》

古代书法家的生活是什么样?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在“烟云尽态——湖南博物院藏《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展(第二期)”中展出的许多书法作品都饱含着浓浓的生活气息,这些书法作品组成了一本“古代书法家生活图鉴”,让我们得以走近名家们的闲暇时光,在点滴碎片中捕捉他们更“接地气”的一面。

五代·杨凝式《韭花帖》

杨凝式(873—954),字景度,号癸巳人、杨虚、希维居士、关西老农等,华州华阴县(今陕西华阴)人。他个性狂傲纵诞,有“杨疯子”之号。他工于行草,用笔奔放奇逸,宋人将其与颜真卿并称为“颜杨”。

《韭花帖》是杨凝式在睡醒之后,饥饿无比,得赐韭花而食,填饱肚子心满意足之后灵感乍现而作。初秋时节,面对这样的珍饈佳肴,怎能不食指大动?在这篇书信中,杨凝式以“朝饥甚”形容自己刚醒时的饥饿状态,读来令人忍俊不禁。“助其肥腴”的意思是肥嫩的羔羊肉在韭花酱的衬托下更加油润鲜美,食之唇齿生香,使人垂涎。看来作为一名“老陕”,早在千余年前杨凝式就熟练掌握了羊肉的最佳食用方式。韭菜物美价廉,其叶、花葶和花均可食用,具有补肾健胃等功效,北方人爱用韭菜包饺子、炸盒子、拌豆腐、摊煎饼,是餐桌上的常客。而以大朵韭菜花为原料制作的韭花酱味道鲜甜,易于贮存,至今仍深受世人喜爱。

在信的末尾,他向友人致以感谢、愉悦闲适、怡然自得的心境溢于言表。从字体章法来看,整幅作品精美至极,清秀洒脱,深得王羲之笔意。后世对此评价极高,董其昌曾说:“少师韭花帖,略带行体,萧散有致,比少师他书欹侧取态者有殊,然欹侧取态,故是少师佳处。”

宋·蔡襄《精茶帖》

蔡襄(1012—1067),字君谟,号莆阳居士,兴化军仙游县(今福建省仙游县)人。蔡襄是北宋名臣,也是书法家、文学家、

茶学家,书法楷行皆妙。

《精茶帖》为蔡襄写给一位朋友(公瑾)的行书短札。通情达理的他先是慰问身处酷暑中的友人,接着又抱怨了一下“日夕风日酷烦,无处可避”的炎热天气,但最终上升到人生哲学的高度,感叹“人生锁如此”。唯有赠友人“精茶数片”,以清茶一壶解心头暑热之燥。蔡襄精于茶道,所作《茶录》总结了宋代制茶、品茶的经验,影响深远。在担任福建转运使期间,他将北苑茶业推向了新的高峰,改进了“大龙团”的品质和工艺,创造“小龙团”作为贡品,使建茶名满天下。范仲淹在《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也提到“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可见北苑茶在当时极负盛誉。他向友人赠送的精茶必是上等等好茶。

在短札写完后,他还顺便询问了牯犀角材质马鞍装饰品的价格。据徐邦达先生考证,此“公瑾”乃是李端愿。“牯犀”是古代岭南产的犀牛角,“作子”是马鞍上的装饰品。从笔法上看,此帖书法行楷相间,法度严谨,浑厚端庄,篇幅虽短,但字字珠玉,淳淡婉美。

宋·张舜民《五味子汤帖》

张舜民,字芸叟,号浮休居士、汀斋,邠州(今陕西彬州)人。张舜民为人正直,善于书画,题评精确,亦能自作山水。

《五味子汤帖》是张舜民给朋友的一封信,其中提到五味子汤的作用等事。据查,五味子汤出自《外台密要》卷十六引《删繁方》,具有温阳益气散寒,敛肺止咳之功效,主治气极寒、伤风、肺虚咳、胸中迫急。主要由五味子、甘草、紫苑、桂心、附子、麻黄等药材组成,这一方剂的用法用量至今仍有标准规范。张舜民在这封书信中还谈到“此当新出时可,今已过时,不可为也。”意思是此药刚制成时疗效显著,现在药效已过,不能用了。对药物效力与保存时长的关系提出了一定看法。除了赠予药物之外,张舜民还为友人“煎数饼”,可能是由蜜糖渍制的橘子做成的橘饼,它不仅能温肺散寒、止咳化痰,而且可以制成药膳“橘饼五味子汤”。由此可见,作者在生活之中是一位

细心养生之人。在《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中,有关药物的笔迹不止此一处,在元代倪瓒书《与默庵诗帖》中,还有作者以大金花丸缓解酒醉后“喉吻痛”的记载,这为我们了解古人生活中的常备药品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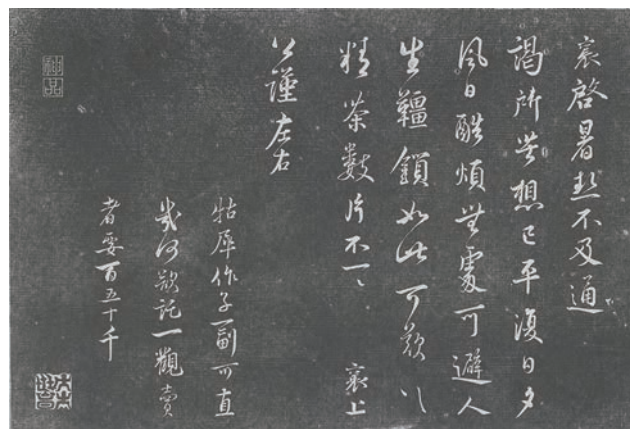
元·赵孟頫《致八弟帖》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水精宫道人、鸥波等,浙江吴兴人。赵孟頫是宋太祖之子秦王赵德芳的后代,宋亡后,在家乡“益致力于学”,成为“吴兴八俊”之一,同时也是世称楷书四大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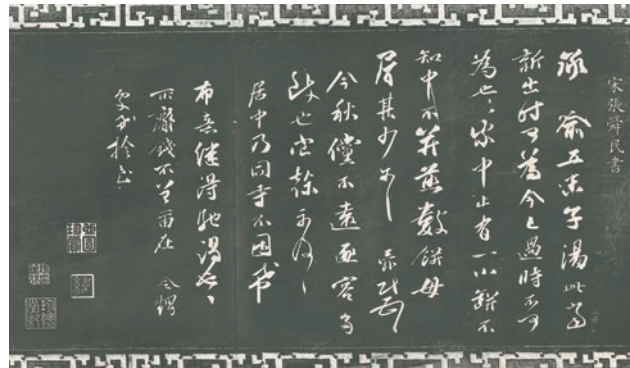
赵孟頫的人生经历了数次转折,有官场沉浮,也有疾病的困扰。在这封给亲人的书信中,除了讲述自身病痛“苦肿未减”之外,他还发出了一份非常细致的“代购”订单。先提到“要一个大三稜”,三稜是一种中药材,是黑三稜的块茎,具有破血行气、消积止痛的功效。随后他说“新到桃花海水团”,冀为买五两寄来”,在一旁的小字批注中,还详细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桃花”是一地名,“须江头蚕团,买始得,又须是屠君瑞家”。这不禁让人好奇,令他如此挂牵的美食到底是什么呢?

《梦梁录·卷十六·分茶酒店》中有一段关于杭州食俗的记载:“杭州人烟稠密……城内外叠铺,不下二百家,皆就此行台。盖铺是制售例如黄鱼干等海水产品的店铺,其后文所列举的“鱼鲞名件”中,就有“海水团”。所谓鲞,指的是鲞鱼和腌腊类的海产品,风味鲜醇,口感极佳。足见赵孟頫不仅对饮食颇为讲究,还是个很有心得的“老口子”。在信的最后一句,他还询问了对方对其所书《千字文》笔法的意见,通篇言语轻松自然,读来妙趣横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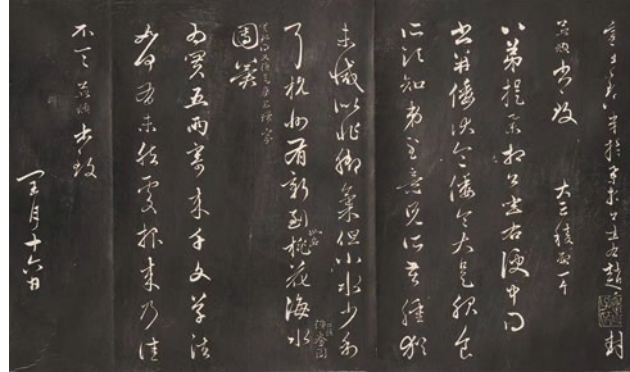
通过一封封书信,我们接触到了古人生活中与我们今天的生活十分相似的一面,也许对他们而言,“飞鸿传书”就像我们的微信交流,纸张笔墨缩短了与朋友、家人之间的距离,日常琐事的交流也承载着热烈的情感。驿寄梅花,鱼传尺素,我们欣赏书帖,感悟书法家们手起笔落间的神韵,也会被字里行间的的生活情趣深深吸引。(湖南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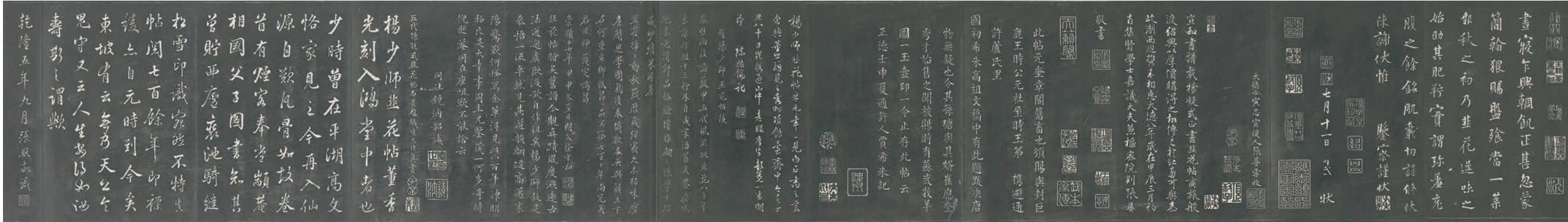
宋·蔡襄《精茶帖》



宋·张舜民《五味子汤帖》



元·赵孟頫《致八弟帖》



五代·杨凝式《韭花帖》

传世瓷器中的龙

陈娟



图1 清 黄釉暗云龙纹盘

图3 清 绿地紫彩海水云纹碗

图5 清 黄釉暗花云龙碗

图6 清 绿釉暗龙凤盘

图2 清 黄釉绿云龙菊瓣盘

图4 清 粉彩八宝云龙大盘

图7 清 红彩云龙格盒

民谚有云:“二月二,龙抬头。”仲春卯月之初,农历二月初二,二十八星宿中“东方苍龙”七宿星象从东方地平线上缓缓升起,状如巨龙苏醒。“蛟龙潜匿隐苍龙,且与虾蟆混和。”等待一朝头角就,撼摇霹雳震山河。”龙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生活在大海里,掌管行云布雨,具有祥瑞征兆的神异生物。自古以来,中国人对这个神秘的东方巨兽有着强烈的原始崇拜。这种崇拜体现在陶瓷艺术领域,便是各种经过艺术加工的“龙元素”的诞生。山东博物馆“瓷·韵——馆藏明清官窑瓷器展”中的明清瓷器,见证了中国人的龙崇拜和对龙元素的偏爱。

等级分明的“颜色釉龙”

闻一多在《伏羲考》中说,“以蛇图腾为主的远古华夏民族,部落不断战胜,融合其他氏族部落,即蛇图腾不断合并其他图腾逐渐演变为龙”。在明清官窑瓷器中,龙形象的等级分明。据《国朝官史》记载,皇帝、太后、皇后主要使用里外黄釉瓷,皇贵妃用的是里白外黄釉,贵妃用的是黄地绿龙,嫔用蓝地黄龙,贵人用绿地紫龙,常在用绿地红龙(图1-图3)。至于答应、皇子福晋、皇子侧室福晋则用“各色瓷盘、碟、碗、钟”等。高温颜色釉有着上千年的发展历史,其形式多样,绚丽多彩,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清代是中国古代制瓷业复苏和高速发展的时期,这期间官窑和民窑都得到了空前发展,高温颜色釉更是众瓷类中一朵鲜艳夺目的奇葩,红、黄、蓝、白、绿、紫、黑等色釉异彩纷呈,众多华美璀璨的陶瓷精品层出不穷。

五彩缤纷的“粉彩龙”

民国学者许之衡编著的《饮流斋说瓷》中记载:“软彩,又名粉彩,谓彩色稍淡,有粉匀之也”。清代康熙皇帝十分欣赏西方的画珐琅技艺,因此清宫造办处利用西洋进口彩料,仿制铜胎珐琅烧造出一批色泽明艳的“珐琅彩瓷”,御窑厂的画师也参与到瓷胎珐琅的制作当中。在对彩料的试制过程中,景德镇陶瓷工匠认识了珐琅彩料中“神”元素的作用,在本土传统釉上彩的基础上创烧出新的粉彩彩料。在之后的发展中,由粉彩彩料制作的瓷器逐渐形成其独立性,成为一种具有自身特点、在五彩缤纷之中仍独具一份清淡幽雅粉彩瓷器。

“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在这件清粉彩八宝云龙大盘(图4)上,盘踞中心的“粉彩龙”体态矫健,龙爪雄劲,在云雾波涛中翻腾、驰骋。怒目圆瞪,吐气如虹的“粉彩龙”与粉彩瓷器所具有的轻盈气质相契合,盘外侧清逸的八宝纹、云雷纹与盘心大气威猛的云龙纹遥相呼应,淡雅的龙纹刻绘与浓淡相宜的色彩搭配相得益彰。

真龙不露相的“暗刻龙”

暗刻是明清时期瓷器上的一种常见装饰手法。一般是用较细的锥状工具,在瓷胎表面浅刻出花纹图案,施釉后入窑烧制,烧成后花纹位于釉下,呈现若隐若现的效果。在暗刻瓷器中,龙纹、云纹是一种常见的元素。

这两件颜色釉暗刻龙纹瓷器(图5、图6),通体素净,鲜亮的颜色之中暗藏玄机。清代官窑高温颜色釉往往色彩鲜亮,从实物观察而言,釉面上的暗刻龙纹并不明显,待仔细观察之后,方有“藏形露影”的神秘感。

清淡优雅的“青花红彩龙”

青花瓷是中国传统瓷器种类之一,以清淡雅雅著称。釉里红瓷器是一种以铜为着色剂的瓷器,烧制难度极高,因此产量稀少。青花红彩瓷,又称青花釉里红瓷器,融合这两种瓷器的烧制方法,在传统的青花瓷基础上,增加一道铜红釉料在瓷器上绘制纹饰的工序,再进行高温烧制,成为一种全新的青花釉里红瓷器。

这件清红彩云龙格盒(图7),青花与釉里红搭配恰到好处,淡雅的青花如意云纹衬托中间张牙舞爪的红彩龙,青花的恬淡优雅与釉里红的浑厚壮丽巧妙融合,成为一件色彩丰富但不花哨,可观赏性和艺术魅力兼具的青花红彩瓷佳品。盖上红龙刻画精细,栩栩如生,张牙舞爪,纵横云海之间。红彤彤的青花红彩龙,带着昂扬喜气。

在华贵精美的瓷器上,龙的形象可以说是花样翻飞。有提到的“釉龙”“粉彩龙”“暗刻龙”“红彩龙”,还有“斗彩龙”“青花龙”“紫彩龙”等,龙的形象也变化万千,有云龙、团龙、八宝龙,还有龙凤、龙鹤等等。作为重要的传统纹饰,它既是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象征之一,也饱含着强大、祥瑞的美好寓意。

见证民族融合的战国金牌饰

马率磊



在邯郸市博物馆通史陈列展橱中陈列着一件普通而又珍贵的文物——战国透雕龙纹金牌饰。说它普通是因为考古发掘时,这样长方形的金牌饰时常被发现;说其特殊是因为它从数万件文物中脱颖而出成为邯郸市博物馆这座国家一级博物馆馆标的创作依托和来源,同时还见证了战国时期民族的融合和发展。

这件战国透雕龙纹金牌饰为国家级文物,长7.2厘米、宽4厘米,厚度为0.3厘米,重约80克。通体金黄色,是中原地区少见的金铜合金铸造饰品,经测定其含金量为40%。它的四周边框勾勒沟纹,中央有一云头状的花朵,两侧主体纹饰各透雕一龙,相对昂首腾空而立,形象威武,犹如云龙在天,活灵活现。在金牌饰背面有两个桥型穿鼻,可以缝缀联结在腰间的革带上,当作装饰用品。

从形式上看,这件金牌饰属于鄂尔多斯式。这种样式的文物集中发现于鄂尔多斯、陕西北部、宁夏、甘肃等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是典型的北方草原地带的一种艺术形式。同时期出土的金牌饰,多以动物互相咬斗、强者捕捉弱者的形象出现,比如出土于河北易县燕下都的神兽噬龙纹金牌饰,还有在内蒙古出土的战国虎斗咬牛纹金牌饰,都表达了当时人们对于自然界物种竞争、“适者生存”理念的认同,表达了他们对于强者的敬畏和赞扬。然而这件金牌饰,其主体纹饰却是中原传统中原的龙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一特殊现象呢?我们知道龙是中原华夏民族的图腾和崇拜物,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龙的形象起源很早,但作为青铜器纹饰,目前最早见于商代二里冈期文化,以后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形式的龙纹出现。《广雅》云:“有角曰虬,无角曰龙”。从龙纹的形式来看,这件透雕金牌饰的应当属于虬龙。虬龙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无角的龙,寓意美好、吉祥,也是战国青铜器上常见的纹饰之一。这件金牌饰的形式属于草原民族,而主体内容却是中原文化的,它是中原农耕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相互融合发展的产物。在华夷观念盛行的战国时期,这两种文化为什么能有机融合在一起呢?这还要从它的出土地说起。

1997年3月,河北邯郸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赵王陵二号墓被盗案件,后经过公安干警的万里追踪,终于将被盗文物悉数追回,完璧归赵。追回的文物当中就有这件金牌饰。赵王陵位于今天的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与永年区的西北交界处,紫山东麓的丘陵地带,距邯郸市20公里。现存五座陵台、七座封土,它们是赵国国王的陵寝。我们知道,邯郸是赵国最后的都城且长达158年,自公元前386年,赵敬侯迁都邯郸以来,先后有八代赵王在此登基,七代国王安葬于此。由于赵王陵整体保存完整,没有经过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因此这七座封土具体分别埋葬着哪位赵王,目前还不得而知。按照考古工作方法对陵台进行编号,依次为一号到五号,其中二号陵和四号陵台上有2座封土,其他均为1座封土。尽管如此,仍然可以确认这件金牌饰属于赵王的陪葬品,是赵国发达手工业、灿烂独特历史文化的遗珍。

战国时期的赵国东临平原,西接太行,北依阴山,南望黄河,在广袤的平原上既有高原,也有平原;既有游牧民族,也有农耕民族。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多元经济形态,孕育出了迥异于中原、陇上、齐鲁、江南的特殊文化——赵文化。李学勤先生在《东周与秦

代文明》一书中,曾将东周时列国划分为七个文化圈,其中中原文化圈“以周为中心,北到晋国南部,南到郑国、卫国,也就是战国时期周和三晋(不包括赵国北部)一带”,北方文化圈“包括赵国北部、中山国、燕国以及更北的方国部族”。根据这样的划分,赵国的南部和北部分别属于中原和北方两个文化圈。在此基础上,不少学者总结出了赵文化具有“二重性”的特点,其基本内涵就是开放、进取、包容,展现了赵国在逐鹿中原时所表现出的改革创新精神特质。这种“二重性”文化也影响到了赵人的生活和生活习俗。

在日常生活中,赵国也常见与胡人通婚,甚至赵国贵族及王室成员中也有胡人血统。赵国人的血脉里就已经有了两种文化的基因,既有草原人的骁勇善战,又有中原人的聪慧稳健,这其中的典型代表人物要属赵国迁都邯郸后的第四代国君——赵武灵王赵雍。

公元前326年,赵雍即位新君。当时赵国内忧外患,形势严峻。尤其是面对强势崛起的中山国不断对外的扩张,几乎要将整个赵国版图一分为二;在对外战争中,赵国更是经常战败。为了摆脱困境,赵雍在公元前307年,毅然决然地实行了“胡服骑射”的改革。这场改革,与之前魏国的李悝改革、秦国商鞅变法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魏国与秦国的改革虽然涉及内部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多个方面,但从制度上、策略上都属于一种文化内部结构的优化与提升。然而赵武灵王的改革,却是两种不同文化的融合发展,他将游牧民族的文化与风俗迁移运用并融入早期以中原农耕文化为主的赵国自身的军事、文化以及日常生活中。可以说赵武灵王的改革,比起其他改革更具开放性、挑战性,而其困难之大、效果之佳、影响之远也皆出乎意料。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骑射”,简单说就是放弃中原华夏族长袍大褂宽袖口的衣服,改穿胡人短衣窄袖服装,学习胡人骑马打仗,衣物鞋子的用料也从布料改为皮革,因此有很多学者认为,今天使用的“改革”一词,便是由此而来。我们知道,当时中原各诸侯国作战主要为车战,学习胡人骑马打仗,赵武灵王是第一人,因此,清末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先生曾对赵武灵王做出了极高评价,称他为“中国黄帝之后的第一人”。华夏族人的长袍大衣,水袖宽裙,是祖制文化,是多少年的继承。他克服了重重困难,让士兵脱去去袖长袍的衣裳,改穿简洁贴体的胡服,练习骑射技能。随后他鼓励西北边境的居民蓄养战马,并招募善于骑马射箭者,建立了一支骁勇善战的骑兵部队,配合车兵和步兵,组成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数年”,史称“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赵国因“胡服骑射”而强国,进而开疆扩土,成为战国后期唯一能与强秦相抗衡的东方大国,同时,胡服骑射改革也由此拉开了中原骑战的历史大幕。赵国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中原农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不断冲突与兼容中,逐渐走向了融合发展,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更是将这种融合发展推向高峰。这件金牌饰极大可能就是在这种民族融合浪潮中设计制作产生的。

一枚小小的金牌饰有机汇聚了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不同特色,见证了战国时期不同民族的融合和发展,也承载着开放、进取、包容的精神特质,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形成渲染了坚实的底色。